

抗戰初期國軍發動淞滬會戰的研究 ——大戰略與戰略理論解析

Exploring the Battle of Shanghai: An Analysis of Grand Strategy and Strategic Theory

羅慶生(Ching-Sheng, Lo)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提 要

有關淞滬會戰的研究甚多，但以歷史資料的再發現與再詮釋為主，本文則採戰略研究途徑進行戰史的個案研究；透過大戰略與戰略相關的理論命題，探討國軍發動淞滬會戰，迫使日軍改變作戰布局的戰略思考及其影響。本文將提出新的觀點，主張淞滬會戰迫使日軍過早進軍長江以南，以致兵力分散，在攻佔武漢後達到克勞塞維茨所謂的「勝利的極點」：任何不直接達到和平的攻擊，必然會以防禦為其終點；這才使蔣委員長「持久」的抗戰戰略成為可能。

關鍵詞：抗日戰爭、淞滬會戰、持久戰、古典戰略論述

Abstract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 on the Battle of Shanghai mainly focuses on rediscovery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This study adopts a strategic research approach to conduct case study as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this battle.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Battle of Shanghai through strategic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grand strategy to discuss the launch of the battle by the Nationalist army, which forced Japanese army to change their war strategy and the post-war impact. This article will present a new point of view: this battle forced Japanese army to enter the Southern China prematurely and thus caused the dispersion of the troops. Therefore, after taking back Wuhan, the Nationalist army achieved Clausewitz's called "the 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 which means if attack of any wars can not make peace directly, it is ended up with defensive condition. Consequently, it made Chiang's strategy of "protracted war" successful.

Keywords: Sino-Japanese War, The Battle of Shanghai, Protracted War, Classical Strategist

壹、前 言

有關淞滬會戰的研究甚多，尤其是國軍

為何發動淞滬會戰的相關議題。不過這些研究以史學為主，即便從戰略著眼，也多屬歷史資料的再發現與再詮釋；從戰略理論的研

究較少且多屬野戰戰略的探討。¹相較史學以詮釋為主的研究途徑，戰略研究以社會學方法論，透過理論解析，在戰略決策的解釋上可提供不同的觀點。同時，淞滬會戰是抗日戰爭的第一場決定性會戰，高度影響戰爭爾後的發展，蔣緯國將軍即主張那是國軍最終能打贏抗戰的原因；²其戰略意義已超越野戰戰略層面，單純野戰戰略的解釋因而易遭史學界質疑，例如迫使日軍改變南北作戰線的說法在國軍相關文獻中看不出，³反而有透過作戰表現以獲得國際同情與支持的期望，因而某些人士認為淞滬會戰只是「打給外國人看」而已。⁴

史學研究者的質疑在於歷史資料未能印證戰略決策；戰略決策為心證，在瞬息萬變的戰爭中很難記錄將領的心智活動，較激進的歷史學者因此有「戰略是否真實存在？」

的質疑。⁵然而，正因為戰略決策是心證，過程很難完整的記載於文獻中；或者基於保密與欺敵等理由，大軍統帥不能或不願將其真正的想法對外透露。⁶因此，縱然文獻中找不到迫使日軍轉變作戰構想的明確指示，也不意味著蔣委員長決心發動淞滬會戰的多重考量中無此意圖；期望透過作戰表現獲得國際同情與支持，也不表示只是「打給外國人看」而已。從戰略研究的觀點，任何軍事行動必有政治目的，當代戰略學者即將戰略界定為軍事手段與政治目的間的橋樑或連結；⁷領導全國抗日的蔣委員長決心發動淞滬會戰時，當然不只是為達到某些特定軍事目標，應還有其他內政、外交等政治效果的思考。透過戰略理論演繹，將是彌補史料不足，理解這場戰爭中戰略決策的有效途徑之一。

本文採戰略研究途徑進行此戰史的個

-
- 1 早期有蔣緯國將軍與三軍大學教官等研究者外，近期則如郭春龍，〈從野戰戰略觀點論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發表於「抗戰時期國軍重要戰役之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中華軍史學會，2012年9月28日）。
 - 2 蔣緯國，《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臺北：黎明文化，1985年），頁23。
 - 3 岳天，〈中華民國對日八年抗戰戰略的探討〉，《中華黃埔論壇—udn城市》，2005年7月28日，〈http://city.udn.com/60321/3038043?tpno=22&cate_no=0〉（檢索日期：2013年1月15日）
 - 4 唐生智，〈衛戍南京之經過〉，中共人民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京保衛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頁4。
 - 5 例如Keegan即認為：在激烈與瞬息萬變的戰爭中，很難記錄將領的心智活動，將帥們在戰時運用的所謂戰略，都是事後或他人的記錄，如何可信？因此戰爭雖然真實存在，但戰略是否真實存在則難以證明，是否如研究者所詮釋的戰略更難獲得證明。John Keegan, *The Battle for History: Re-Fight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Vintage, 1996), chap1.
 - 6 例如民國25年1月24日，蔣委員長以「禦侮與復興之基本要道」為題對陸大將官班精神講話時，即發給各學員《大學》一書，要求詳細研讀。然而該冊書雖寓意「大的學問」，卻不是古籍的《大學》，而是蔣委員長在廬山訓練時所講的「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三篇講演詞，只是以《大學》為書名包裝。蔣委員長還強調：「其全部內容，我們絕對要保守秘密，不能給外國人尤其日本人看見」，並要求學員們在領了這本書後「務必妥慎保存，如果有失落或洩露給人家的，便要以洩漏軍機論罪！」。蔣中正，〈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中正文教基金會》，1934年7月13日，〈<http://www.chungcheng.org.tw/thought/class06/0013/0004.htm>〉（檢索日期：2013年1月15日）
 - 7 例如Gray的定義為：「戰略是軍事力量與政治意圖之間的橋樑，既不是軍事力量，也不是政治意圖，而是為了達成政策目的，選擇使用或不使用武力之研究」；Colin S. Gray, *Modern Strate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 Betts的定義也類似：「戰略是軍事手段與政治目的之間的連結，更是一種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連結」；Richard K. Betts, "Is Strategy an Illu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Autumn, 2000), p. 5.

案研究，透過古典戰略論述的大戰略與戰略相關概念與理論，探討國軍發動淞滬會戰，迫使日軍改變作戰佈局的戰略思考及其影響。戰略理論是從戰爭經驗中歸納出的概念化結論，因而在決策者相對理性，以及戰略行動受戰爭規律拘束的假定下，⁸ 從戰略理論演繹出的推論將可提供戰略決策與行動的合理解釋。⁹ 對抗日戰爭這場「現代化」而不是當代「資訊化」的戰爭來說，歸納近、現代戰爭經驗的古典戰略論述，將是解釋戰爭中行動與結果間關聯性的良好工具。其相關概念與理論命題在本研究中將扮演重要角色，因為它提供研究藍圖，指導研究設計需要蒐集什麼資料，以及使用什麼策略來分析資料。¹⁰ 本文將提出新的觀點，主張「迫使日軍改變南北作戰線使國軍得以戰略持久」的論點雖不符合戰爭發展的實際，¹¹ 蔣委員長發動淞滬會戰主導戰場卻是正確的戰略選擇。日軍被迫增兵上海的問題是過早進軍長江以南，以致戰區擴大而使兵力分散，在攻佔武漢後達到克勞塞維茨(Carl Maria Von

Clausewitz 1780-1831)所謂的「勝利的極點」(The 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任何不直接達到和平的攻擊，必然會以防禦為其終點；¹² 這才使蔣委員長「持久」的抗戰戰略成為可能。

貳、抗日戰爭理論觀點

本節探討理論上的抗日戰爭，即依據大戰略與戰略理論，梳理這場戰爭的可能發展；如此才能理解國軍發動淞滬會戰的決策，是如何的改變了戰爭發展方向。這場從蘆溝橋事變引發的戰爭並不是深思熟慮後結果；日軍原希望控制為地方事件，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在7月8日下午6時42分還發佈臨命第四〇〇號命令，要求北平附近日軍「為防止事件之擴大，應避免進一步行使武力」；¹³ 爾後在強硬派抬頭下妥協，7月11日決心向華北派兵，但仍保留「不擴大局面」的原則。¹⁴ 國軍最初同樣以地方事件視之，負責平津地區防務的29軍軍長宋哲元7月15日還發出通電謝絕國人的勞軍捐款；¹⁵ 而後才在蔣

8 此為本文的研究假定。決策者相對理性意謂：決策者雖然受戰略文化、社會交往或其他個別因素的影響，決策時有其特定偏好，但通常是選擇其認知上認為對其最有利的方案。戰略行動受戰爭規律拘束意謂：戰略行動與結果間可歸納出特定規律，雖然行動的可能結果不只一項，但實現的結果必然源自其特定的戰略行動，因而可透過結果推論其行動的意義。

9 觀察—實證概化（歸納法）—推論—假設（演繹法）—觀察，即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科學之輪」，從以往戰爭經驗中歸納出戰略理論，再將這些戰略理論演繹到特定戰爭上驗證，就完成一組科學之輪的循環。若出現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則將啟動新一輪的觀察與歸納，而建立新的理論。Earl Babbie著，李美華等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臺北：時英出版社，1998年），頁75-79。

10 Robert K. Yin, *Case Study Research* (London: Sage, 1994), pp. 45-66.

11 此一論點據前三軍大學教育長岳天所指出，是民國67年三軍大學編著《國民革命軍抗日禦侮戰史》時研議出的戰略指導理則；然而因缺乏歷史資料佐證，甚受史學界批評。同註3。

12 克勞塞維茨(Carl Maria Von Clausewitz)著，鈕先鍾譯，《戰爭論全集》(On War)（臺北：軍事譯粹社，1980年），頁895-905。

13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國防部史編局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 大本營陸軍部(一)——從日俄戰爭到蘆溝橋事變》（臺北：國防部史編局，1989年），頁643。

14 同註13，頁650-657。

15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年），頁366-367。

委員長的決心下，於8月7日的「國防會議及中央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獲得「或進或退，或遲或速，由中央決定；何時宣戰，亦由中央決定；各省與中央須完全一致，各無異心，各無異言」的抗戰共識。¹⁶戰前雙方雖有特定的戰略思維或原定方針，但實際的戰略決策卻是互動下的產物。梳理抗日戰爭的可能發展，即為釐清戰略決策的可能選項及其所承擔的風險。在本節的討論中將偏重於日軍的部分，這是因為日軍為擁有行動自由的攻勢方，守勢方的國軍則回應日軍攻勢行動；因而從理論上探討日軍的可能行動，將有助於理解國軍的戰略決策。

一、戰略與大戰略概念

戰略的定義多又複雜，經常造成研究者處理上的困擾；不過，若依據「戰略是政治目的與軍事手段間連結」的界定，當可理解戰略的關鍵意義在「連結」的部分，而不是軍事手段本身如何獲得勝利或達到目標。武力的使用與不使用，以及若使用則應於何時、何地使用，都屬於決策者戰略思考的範疇。至於如何使用武力以達到特定目標，則屬於軍事指揮官的野戰戰略。從此一角度探討，才可以理解戰略思考如何發展出「大戰略」的概念。

所謂「大戰略」原是指超越僅具軍事意涵之戰略概念的高級戰略；¹⁷兩者雖然關係密切，戰略也受大戰略的控制，但大戰略的

許多原理卻與戰略相反。¹⁸這是因為大戰略所運用的戰爭工具不只軍事一項，對所望達到的特定政治目的而言，直接投入武力可能不如其他工具或手段來得有效，戰爭勝利所衍生的暴力，也可能產生相反效果。因而「大戰略」一詞雖是而由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 1895-1970)所提出，卻強調是從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策延續」論述所啟發，任務是協調與指導國家的一切力量，使其達到戰爭的政策目的。¹⁹至於當代國際關係或安全研究學者所界定的大戰略則為進化後的概念，例如Rosecrance與Stein將大戰略界定為「調整國內和國際所有資源以實現國家安全」，主張國家要考慮可以支配的全部資源（不僅是軍事資源），以確保國家安全。²⁰不過這是平時指涉，與李德哈特戰時指涉的大戰略概念不同。

就戰時大戰略的觀點，戰爭的目的，就是要獲得一個比較好的和平，即令這個所謂的較好，僅僅是就自己的觀點而言。²¹因而理論上所謂「戰爭的政策目的」，就是對此一和平條件的設定。和平條件雙方設定不同，因而武力較強的一方會試圖透過武力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和平條件。不過戰爭雖然是以武力為核心，但國家可運用的力量卻不僅是武力而已，因此大戰略就是協調與指導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在內的一切力量，以達到此目的。武力雖然是通

16 李雲漢，《蘆溝橋事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頁407。

17 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著，鈕先鍾譯，《戰略論》(Strategy)（臺北：軍事譯粹社，1985年），頁380。

18 同註17，頁423。

19 同註17，頁423。

20 Richard Rosecrance & Arthur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

21 同註17，頁404、423。

往所期望和平最有效途徑，卻不是唯一的途徑。就戰爭中的武力行動而言，勝利本身不是目的，和平才是。正如富勒(J.F.C. Fuller, 1878-1966)所指出：大戰略真正的目標是一種有利的和平，而不是把對方完全殲滅。²²

二、日軍侵華大戰略的選項

在這場「抗日戰爭」或稱之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戰爭中，²³ 日本的大戰略也是要獲得有利的和平。蘆溝橋事變後所謂「不擴大局面」的原則，即意味著日本在佔領北平後仍期望能保持和平。然而佔領北平本身卻已破壞和平，除非日軍願意退出北平回復事前狀態，否則必須思考在破壞和平後如何達成另一個和平。

此時日本可思考的方向有二：一個是透過談判使國民政府承認其對北平及其附近的佔領，亦即簽署協定或條約；另一個則是直接運用武力，讓國軍實質上不能否定。較佳的選項當然是前者，因為無須付出戰爭成本，蘆溝橋事變前日本也已透過此一策略順利佔領東北與河北省的部分地區。蘆溝橋事變後中國的主和者也仍不乏人，其主要論點是國軍戰備不充，戰必致敗，不如繼續忍辱和平以爭取備戰時間。²⁴ 因而日本最初確有

機會透過外交或經濟手段的運作而達到其所期望的和平。

不過，這在蔣委員長決心抗戰後喪失機會。在蔣委員長的觀點，日軍出兵佔領北平並非以此為滿足，終將繼續攻勢佔領其他地區，短暫的和平將無意義，國軍忍辱已到最後關頭；²⁵ 因而即便軍事準備未完成，²⁶ 仍決心抗戰。7月17日宣示「最後關頭」的廬山講話，以及8月7日國防會議「各省與中央完全一致」的決議，都是抗戰之初最重要的戰略決策；不僅凝聚了全國抗戰共識，也賦予蔣委員長實質上領導的權力與責任。²⁷ 只要蔣委員長堅持抗戰到底，日本就喪失透過外交或經濟手段輕易達到所期望和平的機會，只能尋求武力途徑解決。如此，日軍的選項將為：

(一)無限目標

無限目標就是發動全面攻勢，尋求殲滅國軍武裝力量的機會，以摧毀中國抗戰意志，進而佔領整個中國。這途徑直接有效，但必須有足夠實力，並承擔較高風險與戰爭成本。

(二)有限目標

如果實力不夠，則戰略目標就要降

22 富勒(J.F.C. Fuller)著，鈕先鍾譯，《戰爭指導》(*The Conduct of War*) (臺北：軍事譯粹社，1987年)，頁266。

23 史學家吳相湘認為抗日戰爭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結果，是第一次「甲午戰爭」的延續，為與因而將其命名為「第二次中日戰爭」。同註15，頁2。

24 同註15，頁483-484。

25 7月17日蔣中正在廬山第二次共同談話會中發表講話，即表示「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的整個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26 當時督導全國軍備的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在民國26年7月18日的日記中記下：「我軍備至低限度尚需半年至一年」。徐永昌，《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79。

27 抗戰前的中華民國雖然名義上是統一政權，實際上卻延續早期的軍閥割據，部分地方政府未必全然服從中央。8月7日蔣委員長召開「國防會議」，地方軍政首長包括閻錫山、白崇禧、余漢謀、何鍵、劉湘等大員都參加；會中決議抗戰，並強調「各省與中央須完全一致，各無異心，各無異言」，所有與會人員全體起立，一致贊成；蔣委員長因而取得實質上領導全國抗戰的權力與責任。同註16。

為有限，如此佔領中國華北的土地即可。克勞塞維茨即指出：當不能希望完全擊敗敵人時，一個直接和積極的目標即為佔領其領土的一部分。²⁸

以當時日軍實力與國際環境而論，有限目標將是較佳選項；不僅風險低，而且能攫取中國資源，轉嫁戰爭成本。日本已有效控制並取得中國東北資源，此時先求控制華北，爾後再逐次佔領中國其他地區，就有機會將戰爭成本陸續轉嫁給這些佔領區。彼消此長，最後無論如何處理國軍武力，中國都已虛弱到無力否定日本的佔領。因而就長期而言，日軍對中國華北地區採「有限目標」攻勢，其最終目的與「無限目標」並無區別，只是分階段佔領整個中國的過程而已。

日軍這兩種侵華戰略選項，當時中國智識分子已有相當程度的理解，並將前者稱之為「鯨吞」，後者稱之為「蠶食」，並分析過其威脅性。民國26年初，蔣百里即在大公報上撰文指出：中國對日不懼鯨吞，只怕蠶食。²⁹ 中國的戰略家們對日本逐次滿足有限目標的「蠶食」戰略不僅理解，而且深以為憂。

三、日軍侵華攻勢的風險

雖然有限目標的逐次蠶食戰略優於鯨吞，卻是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需要耐心且能克制日軍強硬派的動武衝動，堅持在有效控制華北前，絕不對下一階段目標地區用兵。然而對日軍強硬派而言，蔣委員長既決

心抗戰到底，就遲早要以武力制服國軍，才可能屈服中國抵抗意志。制服國軍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透過會戰；會戰雖然只是達到戰略目的的工具之一，不過在條件適合的情況下常是收效最快者。³⁰ 日軍戰力優於國軍，在會戰中獲勝的機會很高，關鍵在於是否能捕捉到國軍主力；如果可以，則等同解除中國武裝，中國只能屈服，無須耗時於階段性的蠶食。只是中國地域廣大，國軍如運用廣大空間避不決戰，日軍攻勢就可能達到「勝利的極點」，最後在攻守易勢下遭到慘敗，這是日軍侵華的最大風險，拿破崙征俄失敗就是個血淋淋的例子。

(一)勝利的極點

所謂「勝利的極點」是指攻勢的轉戾點。³¹ 除非防禦者已經崩潰，否則任何攻勢都會有個「極點」，達到極點後攻擊者將喪失優勢，成為雙方攻守易勢的開始。這是因為攻勢會隨著進展而消耗力量，當攻擊力量逐漸衰竭，終將無力繼續而不得不轉採守勢。所以任何不直接達到和平的攻擊，必然會以防禦為其終點。

抗日戰爭是民族戰爭，中國人民對日本的侵略感到憤怒；日軍侵入作戰是進入有敵意的地區，必須處處駐防。同時，任何軍隊都有戰略側面，也就是沿交通線兩側的地區，前進愈深則側面愈長，保護側面對前進兵力就形成新的負擔。³² 中國道路系統不完善，擁有戰車、火炮等重裝備的日軍主要沿

28 同註12，頁961。

29 蔣百里，《國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原載於大公報，1937年初）。曾華鋒、蓋立閣、石海明，《20世紀軍事名著導讀》（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二章。

30 同註17，頁388。

31 同註12，頁597。

32 同註12，頁896-899。

鐵路線前進；要保護鐵路交通線，就必須在沿線周邊的城鎮駐軍。因而除作戰損失外，這些分兵防守的問題也將消耗日軍大量兵力，心理上也可能愈來愈鬆懈。克勞塞維茨曾以燈光形容侵入軍的前進：當燈油逐漸降低與離開焦點時，光線也會逐漸減弱，終至油乾燈熄為止；³³ 日軍能夠作戰的兵力，將隨著前進距離的增加而最終耗盡。

中國地域廣大，若國軍避不決戰，日軍即便戰力遠優於國軍，最後也終將無力發動新的攻勢，只能改採守勢防禦。除非，日軍攻擊國軍「重心」(Center of Gravity)，強迫國軍主力決戰。如此才有機會捕殲國軍，解除中國武裝，強迫其接受對日本有利，但對中國來說，則可能是「屈辱」的和平。

(二)中國抗戰的重心

和「勝利的極點」一樣，「重心」也是克勞塞維茨所提出的概念，指一切動力和運動的樞紐，所有一切事情都依賴於其上。³⁴ 是否為重心的關鍵，在於擁有其他作戰事務對其的「依賴性」。重心一旦被毀，整個戰爭機器都將無法運作。所以重心可能是國家領導者、首都、交通樞紐、重工業或精華區，也可能是軍隊本身。因為重心具有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的意義，所以戰爭時是「我們所有一切力量應指向之點。」³⁵

重心的概念雖然明確，但具體的重心為何？則並非容易判明。因為國家建設與運用武裝力量的機制很複雜，難以確認什麼才是「一切事情都依賴其上」的重心。早期

或古代多以皇帝（國王）或首都為重心，因為那是指揮中樞所在，若失去則軍隊喪失指揮，即便兵力尚存也無法再戰。但近代工業化後，國家指揮中樞可在必要時遷移或轉移權力，首都淪陷仍可重整兵力，繼續指揮。因而製造武器裝備的工業區，因是建設武裝力量所必需，反而成為多數軍事家所公認的重心。蔣緯國將軍在分析日軍「速戰速決」戰略時曾指出：³⁶

日軍如能及時打通平漢與粵漢鐵路，不僅能控制中國的心臟地區，且可將中國東西遮斷，南北隔離。更重要的是漢口以東長江下游最富庶地區的人力與物力，在中國將他西遷用來建設抗戰基地前，將之全部侵佔，可使中國無法持久作戰。假定日軍再向東旋，可以迫使國軍主力在平漢與粵漢兩路以東地區，背海決戰。

抗戰前中國的工業設施大多數在沿海，如麵粉廠佔62%，紗廠佔77%，火柴廠佔53%，國防工業有成就的酸鹼工業也都在沿江沿海；³⁷ 同時，中國所不能自製的武器裝備也必須從沿海港口輸入。因此，蔣緯國將軍才會認為東南沿海精華區的人、物力為中國持久作戰所必需，在西遷用來建設抗戰基地前是中國的重心，日軍若攻擊，則國軍只有被迫決戰。

不過，打通平漢與粵漢鐵路是個規模非常大的鉗形攻勢，既要保護全長2,300公里的鐵路兩側，同時還要尋求殲滅國軍主力，

33 同註12，頁899。

34 同註12，頁936。

35 同註12，頁936。

36 同註2，頁18。

37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下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年），頁645。

那需要極大兵力。民國33年日軍曾發動類似的「中國大陸打通作戰」（即一號作戰）：為建立亞洲大陸的交通線而打通平漢、粵漢及湘桂鐵路。作戰地區從黃河南下至越南諒山長2,400公里，日軍共動員40萬大軍，歷時將近一年才勉強成功。³⁸ 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還沒有在中國發動全面攻勢的準備，因而陸軍僅有常備部隊17個師團，雖然後備制度完善，但到民國26年年底才擴充至24個師團。³⁹ 「一號作戰」只是要打通鐵路沿線並無意捕殲國軍，即動用40萬大軍；因此日軍若要透過打通平漢與粵漢鐵路而強迫國軍決戰，則將當時現役的17個師團全部投入可能都不夠。反而是運用絕對優勢的制海權，從海上攻佔中國沿海諸省較為可行。只不過那不易截斷國軍退路，無法殲滅國軍主力。封鎖中國海運的窒息效果，必須陸運也斷絕才能收效；蘇聯若支持中國，則從西北陸運軍需，將可抵銷日本對海運的封鎖。中國地域廣大，日軍兵力不足，若採鯨吞戰略侵華，無論是強迫國軍決戰或封鎖中國都不易成功。

透過大戰略與戰略理論的理解，日軍採取無限目標發動全面攻勢的風險甚高，而成功解除中國武裝或屈服中國抵抗意志的機會卻低，採蠶食戰略則相反。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大本營自己就評估：「絕對不能在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因為當時的國際情勢，不可能在用兵上粉碎中國的持久戰意志」。⁴⁰ 日軍很理解其兵力不足，不可能透過用兵解除中國武裝，因而若要在中國發動攻勢，也將

採階段性有限目標的蠶食，以避免鯨吞失敗後陷入「勝利的極點」，最後在攻守易勢後慘敗的風險。

參、中國戰區的地理環境

在透過大戰略與戰略理論，梳理日軍所可能採取的攻勢行動後，本節將依據地理條件探討日軍在中國地區的作戰。地理是限制戰略運用重要的環境因素，無論作戰命令或計畫，都是在地圖而不是在白紙上繪製。與地理相關的戰略理論包括地緣戰略與軍事地理。地緣戰略主要探討位置與資源因素所產生的敵友關係與互動。從地緣戰略的觀點，日軍侵華如果能順利佔領中國，則下一步就是進攻蘇聯；故中國愈能有效抗日就愈能牽制日軍攻蘇。因此無論蘇聯對國民政府的好惡如何，在戰略利益的理性選擇下都將支持中國，為中國抗日的天然盟友。而日軍如果要取得更多資源並確保海洋運輸安全，就必須控制菲律賓與南洋各國，如此就潛藏與美國、英國等海洋國家的衝突因子。這是影響抗日戰爭發展的外部環境。至於軍事地理則是探討影響作戰行動的地形、障礙與交通因素。日軍侵華是在中國地區作戰，因而須探討中國的軍事地理，才能理解日軍之所以如此採取行動的原因。

一、地理對戰略行動的限制

中國的軍事地理複雜且廣泛，本文探討國軍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決策，因而僅就相關地理論述，並從作為攻勢方的日軍作戰線切入立論。作戰線就是交通線，也就是補給

38 同註15，頁981-982。

39 服部卓四郎，軍事譯粹社譯，《大東亞戰爭全史 第一冊》（臺北：軍事譯粹社，1978年），頁189。

40 同註13，頁618-19。所謂國際情勢，是指蘇聯對中國抗日的支持。

線；因而限制作戰線選擇的地理條件，可從地理障礙與後勤補給這兩個面向理解。地理對作戰行動的限制雖然不會因交戰者的不同而改變，但科技與武器系統的演進，卻將改變地理限制所產生的效果，以往刀、弓箭時代的戰爭經驗在火炮與機械動力出現後並不完全適用。日軍侵華是中國地區第一次大規模的現代化戰爭，中國古代的既有經驗必須修正後才能運用於抗日戰爭的解析。

(一)地理障礙

地理障礙對野戰用兵的限制包括山系與水系。由於大軍跨越山脈的難度超過橫渡江河，因此山系的障礙性高於水系。地理障礙因為有隔離的功能，適合作為不同政權間的自然疆界，而少數能通過這些地理障礙的隘道或渡口，就成為軍事上必守或必攻的戰略要點。

中國地區北有燕山、陰山，西有太行山、戈壁沙漠隔離遊牧民族，主要部分的黃淮平原與長江中下游，則被秦嶺—桐柏山—大別山—淮河分割為南北兩大區塊；因而中國歷史上只要是南北分治，都是以此線為天然界線。淮河諸流雖屬水系，但因該地區水道縱橫，大軍進入後容易被分割殲滅，淝水之戰即為顯例，因而能成為有效隔離的地理障礙。⁴¹

大軍跨越此一地理障礙必須利用山系間的缺口，因此通常有三條路線：1. 秦嶺與桐柏山間；2. 桐柏山與大別山間；3. 淮河諸流。秦嶺與桐柏山之間的主要城市為襄陽，

桐柏山與大別山之間的主要城市為武漢，淮河諸流的北出口為徐州、南出口為合肥；都因為守者必守、攻者必攻，而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古戰場。

(二)後勤補給

補給影響戰力的持續，中國地區廣大，野戰用兵必須考慮遠距運輸對補給的影響。古代運輸通常用騾馬，騾馬也需吃食，在往返下若距離增加一倍，運輸者本身消耗的糧秣就會增加為兩倍；因而補給的難度，是隨著作戰距離的增加而加倍。中國古籍《孫子·作戰》中特別強調：「國之貧於師者遠輸」；《管子·八觀》中更明確指出：「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眾有飢色」。在沒有機械動力的時代，最有利的運輸方式是水運；「水通糧」的戰略優勢，戰國時代的戰略家就已經充分理解。⁴²不過水運是順流而下，戰略利益只為上游所獨享；中國水系多為西向東流，因而中國古代作戰，上游者「由西向東」，遠較下游「由東向西」有利。

(三)現代戰爭的修正

前述地理限制的描述是以往刀、弓箭兵器時代，在加入現代機械動力的概念後須有所修正。機械動力的發明，意味著速度的增加與後勤補給更為容易。鐵路的出現，可以提供快速大量的運輸，通過桐柏山與大別山缺口的平漢鐵路、通過淮河諸流的津浦鐵路，因而都具有強烈的戰略意義。可以逆流

41 大軍通過河流較跨越山區容易，因而無論南征北伐都常取道淮河諸流。淮河因此經常成為南北政權決戰之地。明末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即指出：「自古天下裂為南北，得失皆在淮南」。

42 中國古籍《戰國策·趙策一》記載長平之戰前，趙國宮廷內對趙國接納上黨郡的利弊辯論；其中平陽君趙豹主張拒絕，因為如此必將得罪秦國，而秦國是：「夫秦以牛田，水通糧，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因此「必勿受也！」。

而上的輪船，則使上、下游或東、西向的利益不再有區別。對已現代化的日軍而言，因為擁有強大海軍，更能獨佔海運與長江水運的戰略利益；從海上運輸直達武漢，遠較陸運量大且快捷。日軍對此也有準備，以上海為基地的海軍第三艦隊，即為負責對華作戰而編制，所轄均為適合在河川與沿岸作戰的輕型艦艇。⁴³ 民國26年8月11日，國軍發動淞滬會戰前夕，海軍部長陳紹寬即率艦至江陰，拆除燈標、燈塔等助航設施，⁴⁴ 並將國營招商局海輪7艘、民營公司商輪16艘於次日早上在江陰下游長山港（長江最狹處）執行「沉船塞港」命令，⁴⁵ 以阻止日軍運用長江。這表示當時國軍理解長江因素對日軍是有利的。作戰線「由東向西」不利的概念，在現代戰爭中已經解構。

二、日軍攻勢行動的地理目標

蘆溝橋事變後日軍若續採攻勢，在蠶食與鯨吞這兩個不同的戰略選項下將有不同行動。從地理條件探討，其具體目標應分別如下：

（一）蠶食戰略

有限目標的蠶食戰略雖較有利，但存在著防禦問題。克勞塞維茨即指出：（佔領敵人領土）唯一的缺點，就是一旦我們佔領

敵人領土後就又有防禦它的必要，而這又可能成為某種擔憂的來源。⁴⁶ 國軍若採取截斷交通線、殲滅留守部隊、襲擊運輸車隊與倉庫的戰略，則如約米尼所指出：任何精銳的部隊若是碰到一個巨型民族使用上述戰略，就一定會被擊敗；除非他的實力足以佔領全國所有重點，保護一切交通線，並且還能集中一隻活動的兵力，足以隨時隨地迎擊敵軍的突襲。⁴⁷ 要防止國軍襲擾須動員極為龐大的兵力，除非能有效隔離國軍。因此，鞏固華北佔領區的最佳途徑，就是將國軍驅離後運用自然疆界隔離。佔領北平後的日軍若採蠶食戰略，其進一步行動的具體目標，就是攻取自然疆界的各戰略要點。如此無須殲滅國軍，只要驅離華北即可，以避免付出較高的戰爭成本。從地理障礙理解，日軍要有效隔離華北佔領區，必須控制的自然疆界就是西方的山西高原、南方的桐柏山—大別山—淮河一線。武漢是「桐柏山—大別山」的缺口，徐州則是淮河諸流的入口。因此，日軍的攻勢行動應是以一部沿平綏鐵路西進山西，主力則從平漢、津浦兩鐵路南下，分別攻佔武漢與徐州。

（二）鯨吞戰略

日軍若選擇無限目標的鯨吞戰略，

43 日海軍第三艦隊原於1908年編成，1922年撤銷；民國21年為因應「128事變」與侵略中國而重啟編制。民國27年以出雲號為旗艦，上海為基地，作戰區域包括長江、黃浦江、太湖及北緯33度30分以南至魚山群島沿岸。所轄均為輕型艦艇，出雲號雖為旗艦，但也不過屬砲艦等級，與第一、第二艦隊所擁的航母與戰鬥艦不能比。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國防部史編局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 海軍作戰（一）蘆溝橋事變前之海軍作戰》（臺北：國防部史編局，1989年），頁279-280。轉引自：韓祥麟，〈抗戰時期海軍長江之佈防與抗敵〉，發表於「抗戰時期國軍重要戰役之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中華軍史學會，2012年9月28日），頁16。

44 同註15，頁384。

45 同註15，頁602。

46 同註12，頁961。

47 約米尼(Antoine H. Jomini)，鈕先鍾譯，《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臺北：軍事譯粹社，1985年），頁16。

其攻勢的具體目標就將不再是驅離或擊退國軍，而是要殲滅國軍主力，以解除中國武裝。雖然仍將有具體的目標指向，但重點不是佔領該地區而是要殲滅防守的國軍部隊。因此除主力（或一部）指向目標外，還將有一部（或主力）進行迂迴，以捕捉國軍。隨著企圖心的不同，其具體目標與行動將有以下三個主要選項：

1. 一部（或主力）從華北沿平漢鐵路南下，主力（或一部）從海州（連雲港）登陸後沿隴海鐵路西進，圍殲華北國軍。

2. 一部（或主力）從華北沿平漢鐵路南下，主力（或一部）從上海附近登陸，沿長江直指武漢，圍殲華北與華東的國軍主力。

3. 一部（或主力）從廣州登陸，主力（或一部）則沿平漢鐵路南北夾攻，會師武漢，迫國軍背海決戰，以全殲國軍。

就行動的風險與效果而論，採 1. 案的風險最低，但效果最差；最多只能捕捉到華北國軍，即便成功也不具決定性。國軍主力仍在，抗戰到底的意志不會屈服。採 3. 案效果最佳，若成功將有機會全殲國軍，即便少數脫離也不再具有足夠戰力，中國勢將屈服；但此時日軍兵力不足以既鞏固長達2,300公里的鐵路側面，同時還有兵力圍殲國軍，失敗的可能性高。2. 案則是折衷案，有機會，風險也相對較低，但效果則要看國軍投入的兵力而論。若國軍將主力投入，則有機會予以捕捉殲滅；若國軍未將主力投入，則仍同 1. 案一樣，即便勝利也不具決定性，無法解除中國武裝而獲得有利的和平。

民國26年8月初，日軍沿平漢、津浦兩鐵路南下，與國軍激戰於冀中、冀南；⁴⁸ 8月底，再增兵4個師團，並編組「華北方面軍」。⁴⁹ 這表示日軍將主力投入華北地區；同時，日軍雖南下，但沒有分兵從海上登陸，這意味著日軍只是要驅離或擊退國軍，並無意發動鉗形攻勢捕殲國軍。沿平漢、津浦兩鐵路南下的目標指向，則顯示奪取桐柏山—大別山—淮河—一線戰略要點的意圖。日軍若能順利攻取山西、武漢與蘇北，將能憑藉自然疆界有效隔離國軍。此時即便不能與中國取得協議上的和平，國軍也無法否定其對華北的佔領；少數滲透部隊或游擊隊的突擊，都無法真正威脅日軍。日本將有很好的機會吸納華北資源，轉嫁其戰爭成本。

肆、國軍抗日大戰略

從理論上描繪攻勢方的日軍所可能採取的行動後，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守勢方的國軍應如何回應。攻勢方由於有行動自由，通常都能主導戰場，迫使守勢方追隨其行動。但這不意味著遭攻擊的守勢方只能採取防禦，即便實力較弱，也可以在特定時點集中兵力發動攻擊，以扭轉對己不利的戰局。正如約米尼所指出：消極的守勢必敗無疑，而積極的守勢則往往可以轉敗為勝。⁵⁰

一、國軍抗日的主要限制因素

國軍抗日主要的限制因素，是戰力無法對抗日軍，這不僅是戰前多數人的認知，戰後也獲得印證。以淞滬會戰為例，作戰全期國軍動員70個師傷亡33萬餘人，日軍則動員

48 國防部史編局，《國民革命軍戰役第四部抗日：第二冊（上）初期戰役》（臺北：國防部史編局，1985年），頁218。

49 蔣緯國，《抗日禦侮 第三卷》（臺北：黎明文化，1978年），頁96-97。

50 同註47，頁45。

10個師團傷亡4萬餘人；⁵¹ 以戰力比估約為1：7，以傷亡比算更高達8.3：1。此一軍事效能的落差，可透過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RMA)的理論來理解。

所謂軍事事務革命是指將先進科技納入軍事系統，輔以創新作戰概念與組織適當調適，使得軍事效能得以增進。⁵² 軍事革命的意義不只是軍事科技或武器的突破，必須具備三項重要前提，即技術的發展、準則的創新與組織的調適；⁵³ 因而軍事革命只有在新文明挑戰舊文明，整個社會轉型迫使軍隊在科技、文化、組織、戰略、戰術、訓練、準則與後勤等面向徹底改變時才會發生。⁵⁴ 軍事效能是各文明生活方式的反映，因而不同世代的軍隊戰力難以對比：農業化軍隊無法對抗工業化軍隊，工業化軍隊無法對抗資訊化軍隊。就如同1991年波灣戰爭時伊拉克的工業化軍隊無法抵擋資訊化美軍，或18世紀非洲或美洲的原住民部落無法對抗殖民帝國的遠征軍；日軍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經過軍事事務革命所建立的工業化軍隊，國軍則還屬於過渡時期的農業化軍隊，即便擁有現代武器，但軍事文化、作戰組織與戰術理念等未經調適，無法理解使用這些武器的概念與戰術，戰力差距因而非常明顯。⁵⁵

國軍與日軍存在著世代差距，這意味著中國無法以單獨之力擊敗日本。正由農業向工業過渡的中國社會還無法孕育出現代化軍隊；即便在土地、人口、資源等戰爭潛力上擁有優勢，但沒有國防工業、科技與現代化的軍事知識，無法將戰爭潛力轉化為足以對抗現代化日軍的戰力。舊文明挑戰新文明是個複雜的龐大工程，蔣委員長雖然在民國23年推動「新生活運動」，試圖改變中國「散漫的、割據的、各自為政的、自私自利的非現代國家現象」，但須長時間才能收效。短期而言，中國需要的是外國提供先進武器、訓練與軍事顧問等援助以協助國軍轉型，或是在日軍入侵時直接參戰，以抵銷日軍的戰力優勢。如此戰爭的天平才可能倒向中國這一邊；正如約米尼所指出：一個心懷怒火的民族，準備不惜一切犧牲，而且又有強大鄰國的援助，那麼對他實行侵略，真正是種危險的行為。⁵⁶ 只是這個外部因素必須依賴國際環境，不像其他內部因素可以操之在己。

二、國軍抗日的原定方針

外國的援助對中國抗日有決定性影響，但當時的國際環境卻不利於對中國抗日。「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進佔瀋陽，國際聯盟除了譴責外並未採取實際的制裁行動，整個東

51 國防部史政局，《抗日戰史 淞滬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9年)，頁120。

52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IISS), *Strategic Survey 1995/1996* (New York: Brass's, 1996) p. 30.

53 James R. Fitzmonds & Jan M. Van Tol,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Joint Force Quarterly*, Spring 1994, pp. 25-26.

54 Alvin & Heidi Toffler,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3), p. 32

55 例如淞滬會戰期間，10月25日，白崇禧曾親自指揮桂軍6個師反攻。這些部隊同樣擁有步、機槍等現代化武器，但作戰時卻仍同以往的憑血氣之勇上刺刀衝鋒。雖然作戰極為勇敢，但在日軍的戰車衝擊下，一日間就損失慘重被迫退下火線不能再戰。劉勁持，〈淞滬警備司令部見聞〉，中共人民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八一三淞滬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頁50。

56 同註47，頁10。

北隨即在數年間被日軍逐步佔領。國軍抗日必須因應這不利的外在環境。

國軍抗日的大戰略到底為何？8月7日，「國防會議」上的決議除「或進或退，或遲或速，由中央決定，何時宣戰，亦由中央決定。各省與中央須完全一致，各無異心，各無異言」外，還有「一切照原定方針進行」。這表示「戰或不戰」、「何時戰」、「如何戰」的抗日方針不僅存在，而且早為國軍將領們所知悉。

此一抗日的「原定方針」應為民國23年7月，蔣委員長在廬山軍官訓練團以「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為題的講演中所論述的概念。這三篇講詞曾以《大學》為書名裝訂成冊並發給國軍將領。民國25年1月24日，蔣委員長在陸大將官班精神講話時還特別強調：「其全部內容，我們絕對要保守秘密，不能給外國人尤其日本人看見」。歸納這三篇講詞，抗戰的主要概念可區分為兩個階段：

(一)先避免與日本決裂，以爭取國軍轉型時間。

(二)若不得已決裂，則以空間換取時間，以待國際局勢轉變為對中國有利。⁵⁷

避免決裂就是容忍日軍的步步進逼；這是日軍攻佔北平前的國軍態度。國軍的軍

事改革當時正在進行。民國24年1月，國軍召開全國軍事整理會議，計畫在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下以3至4年時間編練60個「新編師」。⁵⁸ 這個計畫雖然延攬了德國顧問，但在日本施壓下，未能順利採購到德國現代化軍事裝備，只能依原有編制武器調整充實。⁵⁹ 蘆溝橋事件爆發後，「新編師」的整編計畫雖然還未完成，但抗日的民氣高漲，政治環境已不容許國軍繼續容忍；⁶⁰ 因而在8月7日國防會議中決心抗戰後，抗日大戰略進入第二階段。

當時可能的外國援助，最有機會的是蘇聯。中國抗日對蘇聯有地緣戰略利益，因而可期待將支援中國抗戰。不過俄軍曾敗於日軍，實力相對有限，不足以扭轉戰局；蔣委員長期望的外援其實是包括英、美、法、蘇的共同抗日。⁶¹ 只是這些大國的亞洲利益雖然都與日本衝突，但在歐洲面臨納粹德國的威脅，暫時無心處理亞洲事務。不過，如果中國抗戰能夠堅持到底，將有機會改變國際形勢，使英、美、法、蘇願意共同干預日本。國際環境的轉變需要時間，而中國地域廣大，因而以空間換取時間，以待國際局勢轉變，就成為國軍抗日進入軍事對抗階段的戰略構想。

57 蔣委員長在廬山軍官訓練團演講「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時即指出：「他要佔我們1省，至少時間就說是1個月，如其統計起來，他要佔我們18省，至少要費時18個月，這18個月時間，那國際形勢的變化還了得？何況他1個月必不能迅速佔領我們1省呢？」。此即為「以空間換取時間，以待國際局勢轉變」的概念。

58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臺北：國防部史編局，2002年），頁277-287。

59 同註58，頁345-363。

60 徐永昌在日記中就深為感嘆：「以我國防論，能再容忍半年實較有利，惟日軍人或不容許，而中國自身亦不容許，奈何！」。同註26，頁76。

61 蔣永敬即認為，蔣委員長堅信侵略國家的對面，一定會產生一個英、美、法、蘇的反侵略聯合陣線來；我英勇抗戰，定可改造國際形勢，如我繼續努力抗戰下去，定可達到各國在遠東敵視日本，包圍日本的目的，使日本陷入絕對的孤立。蔣永敬，〈對日抗戰之政略—就蔣公中正思想言論之分析〉，《近代中國》，第60期，1987年8月，頁50。

此一「持久」或「持久消耗」戰略，即為國軍抗日的「原定方針」。⁶²不過，日軍同樣也企圖採持久戰略。日軍參謀本部在1937年9月20日上奏天皇的《國軍計劃大綱》中即指出：「對中國之積極作戰以十月底為限，爾後轉移為持久作戰」。⁶³所謂「持久」是個相對於「速決」的概念，理論上是避免決戰，以等待雙方力量均衡的局面發生變化；無論是等到同盟國參戰、從另一個戰場調生力軍來，或讓經濟來決定最後勝負。⁶⁴因而運用這種戰略最重要的條件，是須讓敵人的消耗量超過自己的消耗量。⁶⁵

戰爭須付出高昂成本，日本國力將因戰爭而消耗。因此日本雖然軍事力量強大，但戰爭潛力不如中國，戰爭拖得愈久對中國愈有利。就這點而言，中國採持久戰略是正確的。

然而，日軍若採取有限目標的蠶食戰略，日本國力就未必會消耗。因為有限目標戰略是以佔領敵國部分領土為目標，目的即為轉嫁戰爭成本。日本若能有效控制華北，吸納其資源，將可因戰爭成本的成功轉嫁而相對增強實力，時間未必站在中國這一邊。這是日軍所謂「持久戰」的戰略意涵。

中國不懼鯨吞，只怕蠶食；因而國軍「持久戰」要能成功，關鍵是要打破日軍的「持久戰」，亦即避免日軍採階段性攻勢將華北資源完全攫取的蠶食戰略。如此國軍就必須採取積極行動，否則在日軍主導戰場

下，消極回應將必敗無疑。

伍、淞滬會戰與日軍戰略的轉變

民國26年8月7日國防會議後，中國抗戰到底的共識已經形成。此時的日軍動態，除華北日軍一部沿平漢、津浦兩鐵路南下，另一部沿平綏鐵路西進外，海軍也有在華東增兵的現象。這是國軍發動淞滬會戰前所面臨的軍事形勢。

一、國軍持久的戰略思考

戰略決策的形成通常有複雜的多重考量或所期望達到的各種效果，釐清這些考量或所期望的效果，是理解戰略決策的重要途徑。從大戰略觀點，運用軍事手段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條件較好的和平，而不僅是為了獲得會戰的勝利；因此，若能達到預期效果而有利於最後的較好和平，即便會戰失敗也屬戰略成功。

中國的抗戰需要外援才有機會獲勝或得到條件較好的和平，但當時國際局勢不利，因而蔣委員長期望透過持久戰略，以空間換取時間，以待國際局勢轉變。就戰略理論而言，國軍應避免大規模會戰，因為持久消耗戰略是以「讓敵人的消耗量超過自己的消耗量」為原則，攻佔北平後的日軍士氣正旺，大規模會戰不僅容易戰敗，戰敗後也將遭到重大損失；克勞塞維茨即指出：退卻中的防禦者在戰敗之後所受的損失，將比自動撤退較為嚴重。⁶⁶因此，國軍最好的戰略選項應

62 吳相湘認為國軍的「原定方針」就是為「全面抗戰，採取持久消耗戰略」。同註15，頁383。蔣緯國也指出是持久戰略，即「以空間換取時間，逐次消耗敵人，以轉變優劣形勢，爭取最後勝利」。同註49，頁96。

63 同註13，頁713。

64 同註17，頁381。

65 同註17，頁381。

66 同註12，頁743。

為主動向內地轉進，以保存實力，並引誘日軍深入，迫使日軍實力分散後而達到「勝利的極點」。

不過這個戰略卻有以下缺失：

(一)中國須有外援才有機會獲得最後勝利，而要爭取外援則須表現出保衛國土的決心，主動轉進將被視為畏戰或無力自衛，難以說服國際支持。⁶⁷

(二)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民心求戰，蔣委員長不能迴避此一民意，否則有軍心動搖的危險。⁶⁸

(三)更重要的是此戰略成功條件在能「誘敵深入」；然日軍若不「深入」，僅停在太行山與桐柏山一大別山—淮河之線以鞏固其對華北的佔領，則國軍的持久戰略就將破產。

國軍必須打破日軍的蠶食戰略才有勝利機會，因而主動轉進以保存實力，或尋求敵後游擊戰的機會，都不符合國軍持久戰的真正需求。因為日軍若成功佔領太行山與桐柏山一大別山—淮河一線的戰略要點，就能有效隔離國軍襲擾，華北的敵後游擊戰將落空。國軍持久戰略成功的條件在能達到以下效果：

(一)能表現國軍保衛國土的決心與能力。

(二)能鼓舞全國軍民士氣。

(三)能引誘或迫使日軍進軍長江以南，改變其蠶食戰略。

因此，將主力置於華北阻擋日軍南下並無意義；因為那最好的結果也不過延緩日軍攻佔太行山與桐柏山一大別山—淮河一線的時間。而在上海發起攻勢，則有機會誘敵南下，創造國軍持久戰略成功的條件。李德哈特即指出：（戰略行動）真正的目標並不是會戰，而是要尋求一種有利的戰略情況。⁶⁹日軍若不增兵上海，上海駐軍就可能被國軍殲滅，如此不僅士氣將遭嚴重打擊，國際局勢都可能轉趨不利；但若主力增援上海，就越過桐柏山一大別山—淮河的自然疆界線，除非在擊退國軍後撤回華北，否則有限目標的蠶食戰略，就被打破。

二、淞滬會戰的發動

淞滬會戰雖然以8月15日為起始日，⁷⁰但局勢塑造的時間更早。在8月7日之前，國軍將領即有「先發制敵」的主張，並獲蔣委員長重視。⁷¹8月9日發生「虹橋機場事件」，日軍軍官大山勇夫企圖闖進虹橋機場遭衛兵

67 1935年8月，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法爾豪森將軍(General Leutnant von Falkenhausen)曾提出「應付時局對策」，其中即指出：華盛頓九國公約實際上早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則他國無力相助。中國應極盡所能保全國土，為保全國土而奮鬥，全力自衛，外援或許稍有希望。黃慶秋，《德國軍事顧問團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9年），頁56。

68 當時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的王世杰，曾經在日記中記載：「（8月5日）今日午後晤汪精衛先生，據云胡適之所提和議意見，彼已轉告蔣先生。蔣以為軍心搖動極可慮，不可由彼呼籲和議，也不可變更應戰之原議。」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1995年），頁388。

69 同註17，頁422。

70 淞滬會戰是從8月15日晨開始，之前僅記載「完成圍攻準備」。蔣緯國，《抗日禦侮 第五卷》（臺北：黎明文化，1978年），頁13。

71 負責上海地區作戰的張治中曾在7月30日向南京意見具申：「我在北方作戰，固不宜破壞上海，自損資源，然若敵方有左列徵候之一，如：(1)敵決派陸軍師團來滬，並開始登輪輸送時；(2)敵派航空母艦來滬時；(3)敵長江艦隊來滬集合時；(4)敵在滬提出無理要求，甚至限期答覆，即斷定敵發動無疑。則因我軍主力遠在

射殺，上海緊張形勢升高。由於128事變後簽訂之「淞滬停戰協議」中規定，上海市不得駐中國軍隊，故當時上海附近僅有警察總隊及江蘇保安部隊兩個團，以及在京滬鐵路沿線的87、88兩個師。⁷²為保持在上海方面行動的彈性，8月11日夜，該兩師即奉命向上海推進。⁷³深夜，海軍執行「沉船塞港」命令。12日，日軍發現國軍部隊調動，當天晚上也進入緊急狀態。⁷⁴13日，雙方第一線警戒部隊發生衝突。15日，第87、88師發起攻勢，到18日則暫停攻勢。⁷⁵此時蔣委員長尚未真正下定決心。

8月13日，蔣委員長徵召正在廬山訓練軍官的軍委會軍政次長陳誠赴上海視察。陳誠返京後提出建議，認為日軍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快速部隊沿平漢鐵路直趨武漢，武漢一旦失守，則中國將東西縱斷為二。故不如擴大淞滬戰役，誘敵南下；此一建議終於促使蔣委員長下定決心，將主力投入華東，並委陳誠為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增援上海。⁷⁶8月20日，國軍頒布「主力集中華東」的戰爭指導方針，⁷⁷淞滬會戰擴大。

三、淞滬會戰後日軍戰略的轉變

對日軍而言，國軍增援上海後必須投入兵力回應，否則上海駐軍萬餘人極可能被殲滅。日軍若在國際化的上海遭擊敗，國際聲望將嚴重受挫；而國軍則證明不僅有意願，而且還有能力擊敗日軍，國際同情與支持中國的聲浪將大起。另一方面，國軍主力集中在上海附近也形成令人垂涎的大餅，尤其戰力較強的中央軍幾乎全部投入。這讓日軍有機會一次殲滅國軍主力而解除中國武裝，進而達到其所期望的和平。這個大餅的引誘力夠強，終於誘使日軍將主力轉用到江南，並從國軍的戰略翼側登陸，企圖一次即將國軍主力捕捉殲滅。

淞滬會戰的結果國軍雖然戰敗，但主力並未遭日軍捕捉，這使日軍陷入尷尬的窘境。在江南地區作戰並非日軍原來的戰略構想，但若將主力從海運調回華北，則留在上海的少數駐軍可能再遭國軍威脅；然全軍撤出上海，則無異放棄會戰成果，等同戰敗，有損士氣。日軍侵華戰略因而大幅修正，從蠶食轉為鯨吞，尋求直接解除中國武裝的機會。因而日軍繼續西進捕捉國軍主力，在攻取中國首都南京後，接著圍殲華東國軍。爾

蘇、常以西，輸送展開必須時間，且上海保安隊抵抗力薄，諸種關係，似宜立於主動地位首先發動較為有利。曾迭電具申意見，未蒙核示，茲預擬本軍行動標準，謹申呈核，是否有當，敬祈示遵」。此一建議並獲得回電：「卅未電悉，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同註55，頁17。

72 同註70，頁7-8。

73 同註51，頁6-7。

74 同註13，頁694。

75 張治中在「揭開八一三淞滬抗戰的戰幕」一文曾指出，8月13日、14日、18日，共三次接到暫停進攻命令。同註55，頁20-23。另蔣緯國在《抗日禦侮 第五卷》描述淞滬會戰是從8月15日晨開始，之前僅記載「完成圍攻準備」（頁13），以及「18日暫停攻擊，並調整部署」（頁21）。

76 同註68，頁317。

77 該戰爭指導方針為：「國軍以一部集中華北，重疊配備，多線設防，特注意固守平綏東段要地，最後確保山西、山東，力求爭取時間，牽制消耗敵人。以主力集中華東，迅速掃蕩浙滬敵海軍根據地，阻止後續敵軍之登陸，或乘機殲滅之，並以最小限兵力守備華南沿海各要地」。同註49，頁101。

後雖然贏得徐州會戰，但仍未如願捕捉到國軍主力，最後在攻佔武漢後達到「勝利的極點」。此後則尋求封鎖中國，攻佔中國東南沿海，以斷絕海外資源的輸入。只是攻佔東南沿海後，並不能阻止中國從西北陸運獲得武器彈藥的補充。⁷⁸

李德哈特指出：咬下的分量超過可以嚼爛的限度，那就是一種愚行。⁷⁹日軍原本可以穩穩的佔領華北，運用華北資源轉嫁其戰爭成本。但在主力投入華東後難以兼顧，在兵力不足下奪取山西的作戰並不順利；隔離不成功，國軍（含共軍）因而有機會發動敵後作戰。除了原來的東北外，日軍在華北、華東與華南等新的佔領區，都只能控制大城市與鐵路沿線，無法充分運用佔領區資源轉嫁其戰爭成本，有限目標的持久戰略破產。

而國軍雖在淞滬戰敗，但已表現出保衛國土決心，不僅一新國際輿論耳目，也鼓舞了軍民士氣，尤其是迫使日軍改變蠶食戰略的目的順利達成。正如蔣委員長在「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指出：⁸⁰

敵人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兇燄，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之野心，對於中國為鯨吞，而非蠶食，已由事實證明。就中國本身論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鯨吞之禍，

顯而易見，蠶食之禍，緩而難察。敵苟持慢性之蠶食政策，浸潤侵蝕以亡我於不知不覺之間，則難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敵愾同仇之義，馴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後已；今則大禍當前，不容反顧，故為抗戰全局策最後之勝利，今日形勢，毋寧謂於我為有利。

國軍發動淞滬會戰，是正確的戰略決策。

陸、結 論

從理論歸納國軍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義，雖然表面上在上海附近集中主力以決戰態勢孤注一擲，違反了持久戰略保存實力與消耗不能超過敵軍的原則，但進一步分析卻是個巧妙、具創意且符合戰略理論的行動。若不以其上海駐軍極可能遭擊滅的壓力，不足以迫使日軍轉用兵力；不以國軍部隊已高度集中的大餅，不足以誘使日軍投入主力而改變其戰略佈局。正如克勞塞維茨在其名著《戰爭論》中最後一章的標題：「設計導致敵軍完全失敗的戰爭計畫」，⁸¹國軍發動淞滬會戰使日軍改變了其原本有利的蠶食戰略，而陷入明知不可的鯨吞冒險。國軍真正的風險，是在主力不能被日軍捕捉，而不是戰敗。日軍則過早進入華中與華南，兵力需求大增，華北資源又不能充分運用。這使

78 中國抗日對蘇聯有地緣戰略上的利益，因而海路中斷後即從西北陸運大量武器裝備給中國。僅民國27年1月中國即購入20個師的裝備，包括110mm重砲80門，砲彈8萬發，76mm砲160門，砲彈16萬發，37mm戰防砲80門，砲彈12萬發，重機槍300挺，機槍600挺，槍彈共1千萬發。蘇聯對華軍售直到德軍入侵後才結束。國防部史編局，《國民革命建軍史 第三部 八年抗戰與戡亂(一)》（臺北：國防部史編局，1993），頁665-672。

79 同註17，頁400。

80 蔣中正，〈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中正文教基金會》，1937年12月16日，〈<http://www.chungcheng.org.tw/thought/class07/0011/0010.htm>〉（檢索日期：2013年3月25日）

81 同註12，頁971。

日本陷入資源不足以支撐龐大戰爭支出的窘境。在中國作戰陷入勝利的極點後，只好入侵東南亞以爭奪資源，如此則引爆了太平洋戰爭。

這也印證了戰略理論所強調主動攻勢精神在弱勢環境下的可貴，正如克勞塞維茨所指出：⁸²

只有採取以決定為目的的積極措施始能獲致大勝，僅等待局勢的轉變將永遠無此可能。簡言之，即令在防禦中，也只有主要的打擊才能帶來主要的收穫。

國軍是守勢方，在日軍採攻勢擁有行動自由下，很容易因戰場由對方所主導而陷入被動。被動的等待局勢變化是危險的；即便實力弱勢，也必須適當的在對方不預期場域發動攻擊，才有獲得最後勝利的機會。

收件：102年5月22日

修正：102年8月16日

接受：102年8月21日

82 同註12，頁969-70。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李雲漢，1987。《蘆溝橋事變》。臺北：東大圖書。
- 吳相湘，1973。《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
- 吳相湘，1973。《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下冊》。臺北：綜合月刊社。
- 徐永昌，1991。《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國防部史政局，1967。《抗日戰史 淞滬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局。
- 國防部史編局，1985。《國民革命軍 戰役第四部抗日：第二冊（上）初期戰役》。臺北：國防部史編局。
- 國防部史編局，1993。《國民革命建軍史 第三部 八年抗戰與戡亂(一)》。臺北：國防部史編局。
- 黃慶秋，1967。《德國軍事顧問團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
- 曾華鋒、蓋立閣、石海明，2011。《20世紀軍事名著導讀》。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劉鳳翰，2002。《戰前的陸軍整編——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臺北：國防部史編局。
- 蔣永敬，1993。《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
- 蔣百里，1945。《國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
- 蔣緯國，1985。《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臺北：黎明文化。
- 蔣緯國，1978。《抗日禦侮 第三卷》。臺

北：黎明文化。

蔣緯國，1978。《抗日禦侮 第五卷》。臺北：黎明文化。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國防部史編局譯，1989。《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 大本營陸軍部(一)——從日俄戰爭到蘆溝橋事變》。臺北：國防部史編局。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國防部史編局譯，1989。《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 海軍作戰(一)蘆溝橋事變前之海軍作戰》。臺北：國防部史編局。

服部卓四郎著，軍事譯粹社譯，1978。《大東亞戰爭全史 第一冊》。臺北：軍事譯粹社。

專書譯著

- Babbie, Earl著，李美華等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臺北：時英出版。
- Clausewitz, Carl Maria Von著，鈕先鍾譯，1980。《戰爭論全集》(*On War*)。臺北：軍事譯粹社。
- Fuller, J.F.C.著，鈕先鍾譯，1981。《戰爭指導》(*The Conduct of War*)。臺北：軍事譯粹社。
- Hart, B. H. Liddell著，鈕先鍾譯，1985。《戰略論》(*Strategy*)。臺北：軍事譯粹社。
- Jomini, Antoine H.著，鈕先鍾譯，1985。《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臺北：軍事譯粹社。

專書論文

唐生智，1987。〈衛戍南京之經過〉，中共

人民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京保衛戰一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頁4。

劉勁持，1987。〈淞滬警備司令部見聞〉，中共人民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八一三淞滬抗戰一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頁50。

期刊論文

蔣永敬，1987/8。〈對日抗戰之政略一就蔣公中正思想言論之分析〉，《近代中國》，第60期，頁41-56。

研討會論文

郭春龍，2012/9/28。〈從野戰戰略觀點論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抗戰時期國軍重要戰役之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中華軍史學會。

韓祥麟，2012/9/28。〈抗戰時期海軍長江之佈防與抗敵〉，「抗戰時期國軍重要戰役之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中華軍史學會。

網際網路

岳天，2005/7/28。〈中華民國對日八年抗戰戰略的探討〉，《中華黃埔論壇—udn城市》，<http://city.udn.com/60321/3038043?tpno=22&cate_no=0>。

蔣中正，1934/7/13。〈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中正文教基金會》，<<http://www.chungcheng.org.tw/thought/class06/0013/0004.htm>>。

蔣中正，1937/12/16。〈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中正文教基金會》，<<http://>

www.chungcheng.org.tw/thought/class07/0011/0010.htm>。

外文部分

專書

Gray, Colin S., 1999. *Modern Strate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egan, John, 1996. *The Battle for History: Re-Fight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Vintage.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IISS), 1996. *Strategic Survey 1995/1996*. New York: Brass.

Toffler Heidi & Alvin, 1993.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Rosecrance, Richard & Arthur A. Stein, eds. 1993.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Yin, Robert K., 1994. *Case Study Research*. London: Sage.

期刊論文

Betts, Richard K., 2000. "Is Strategy an Illu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pp. 5-50.

Fitzsmonds, James R. & Jan M. Van Tol, 1994.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Joint Force Quarterly*, Spring 1994, pp. 23-32.